

好习惯比能力更重要

13

热点关注



滕朝阳 著
新华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。然而,太多的自以为是的,太多的似是而非,太多的跟风盲从,使很多为人父母者至今未能成为这一理念的自觉践行者。著名教育专栏作家滕朝阳用实际的育儿经验告诉年轻的家长们,家庭教育是成长无可替代的奠基,而父亲的言传身教之于子女成长具有母亲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他反思管理孩子的经验以及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,并上升到教育理论,从中发现很多有益的经验,对家庭教育很有帮助。

上期回顾

如果希望听到孩子主动向自己倾诉在学校的一切,那么家长就既要学会倾听,也要学会宽容。

孩子放学回到家中,是先做家庭作业,还是先去玩?如果总是先做作业或先玩,就分别成为一种各自的习惯。但习惯的形成,与行为选择分不开,也就是说,行为选择及其坚持,乃是习惯养成的一般规律。

若让孩子自己选择,他一般是选择先去玩,再来写作业。这也不无道理。在学校上了一天课,回家接着做作业,未免有点枯燥单一,而且,爱玩是孩子的天性。但这样的习惯好不好呢?相信大多数家长都不会说好。处理事情总有轻重缓急之别。在特定的时间内,作业比玩更重要,况且很多孩子玩起来就往往把作业的事给忘了。

现实生活中,有的孩子是做完作业再玩,有的则是先玩再写作业。这两种不同的行为习惯,不是孩子生来就有的差异,而是经过选择逐渐养成的结果。

听说,有的孩子到国外留学,居然还不会穿衣、吃饭,做妈妈的只好跟着陪读。这的确很过分,书都读到高中了,生活自理能力却相当于残疾人,甚至连残疾人都不如。

国内也有一些大学生,入学除了带价格不菲的数码产品,有的还带了足够一个学期用的生活品。一名男生竟然带了几百双袜子,说是“袜子两天一双,不用洗,直接扔了”。

这些事例当然都有些极端,有人认为现在的孩子缺少挫折教育、苦难教育,所以才造成自理能力的缺失。在我看来,这与其说是能力的问题,不如说是不良习惯的表现,就像回家不写作业先去玩一样,久而久之才有的积习。

人们把习惯谓之“第二天性”,即意味着培育的重要。只有习惯养成了,才能成为自然而然,仿佛是与生俱来的特性。而孩子习惯的养成,

无不受到家庭的深刻影响。现在在很多孩子爱喝可乐、吃汉堡,这不能说是天性,只能说是习惯。许多父母说起孩子的不良习惯,都大摇其头,却对自己的行为不加省察。

但父母对孩子习惯形成的影响,又分为两类,一类是自身习惯的影响,一类是孩子成长中教育的影响。爱看电视的父母,起居无规律的父母,更有可能使孩子养成同样的习惯。

现在有的孩子爱说脏话,这与父母在家里说脏话有关。我曾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一个小学男生,在小区里用极其肮脏的话骂另一个孩子。但有的孩子说脏话,影响未必来自自己的家庭,而是受了其他孩子的影响,而其他孩子无疑又是受了他们父母的影响。

父母自身的不良习惯,很容易在孩子身上被复制,这对父母来说,实在是一件烦恼的事情。少看电视或不看电视,或许还做得到,要一个改掉抽烟的习惯却不太容易。倘若戒烟一时做不到,那么,至少也不要让孩子面前抽烟,更不应该为自己抽烟找借口。

在教育孩子过程中,父母对孩子养成坏习惯的影响,总结起来有两个原因:一是一味地顺从孩子,二是一味地替孩子代劳。事实上,这两者又相互缠绕,经常以交叉的形态出现。只有一个孩子的现实,使很多父母对孩子的要求不忍心加以拒绝,甚至形成无条件满足的习惯。孩子哪怕是想要天上的月亮,也恨不得做一架通天梯去摘下来。孩子找理由不愿坚持做某件事情,也就不去督促。这样,孩子就容易形成自我中心主义,养成娇骄二气。

不过,在孩子较小的时候,父母的适度代劳,却未必会导致孩子形成不好的习惯。比如,在孩子上小学

期间,帮助他们拿拿书包就没有什么不可以,实在是那沉甸甸的包袱,易于把他们稚嫩的脊背压弯。但当他们上了初中,还要父母拿书包,这就可能有点依赖性了。而且,这种现象一定不会孤立地存在,在学习、生活的其他方面,同样会有类似表现。我也不太赞成小孩上小学时,为了培养他们的独立能力,就把他们寄宿在学校,因为这个时期正是家长对孩子可以发挥有效影响的阶段。过早地把独立、自理这样的课题交给孩子,还可能使他们受到不可测的伤害。

童年是养成习惯的重要时期。我儿子从进入幼儿园时才开始学穿衣服,那个时候怎样穿,现在还怎样穿。但一个好习惯真正养成,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比如,幼儿园期间,儿子叠被子就叠得比我还好,回家也把自己的小被子弄得整整齐齐,现在却似乎很少这样做。这不说明他没有这个能力,或是能力退化了,而是把这个习惯渐渐丢弃了。有的父母习惯很好,但这并不意味着榜样的力量真的无穷。爱锻炼、爱读书、爱卫生的父母,自然会对孩子发生积极的影响,但这种影响很可能是不持续的,孩子可能更倾向于坐在桌前玩游戏,躺在沙发上看电视,或是身体感到累了就想逃避洗澡。所以,孩子养成好习惯,家长督促必不可少。这也可见,习惯是第二天性,毕竟不是人的本真。但坏习惯,却无需努力也很容易形成,老话说“坏样一学就会”。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奇怪,因为坏习惯往往体现、迎合了人性的弱点,而好习惯则倾向于克服人性的弱点,提升人的存在价值。比如,勤劳是蜜蜂的天性,我们根本不懂得它们“为谁辛苦为谁忙”,而好逸恶劳却似乎是人的天性。一个人要避免自身的腐败,就要

养成蜜蜂那样勤劳的习惯。

英国著名哲学家、思想家洛克认为,教育的手段不是教训,而是从小培养儿童的良好习惯;一旦坏习惯和不良品德占据幼小的心灵,就会成为石头上的雕刻,改变将困难重重。这话说得很有见地,也很有分寸。坏习惯一旦养成,要改是不可能,对侵入骨髓的习惯,更相当于脱胎换骨,改起来的确不易。由坏习惯改正的难,也可以看出,在习惯与能力之间,应该把前者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。理发是一种专门技艺,但学几个月,就可以独立操作,而去除懒散的习惯则要难得多。而且,好习惯养成了,能力的增长也就在其中。有的孩子养成了自觉学习的习惯,那么,他一定会比那些要么不学习、要么挑灯夜战的孩子,更懂得安排学习,把握学习节奏,他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效果也会更好。

养成好习惯是个渐进的过程,免不了要与人性的弱点作斗争,需要克服虚荣、贪婪、自私、固执等一类常见的习性,做父母的自然要有耐心。去掉一个坏习惯,同样是一个渐进的过程,或者来得更艰难些,因为不但要克服坏习惯形成的心理依赖、路径依赖,还要重塑坏习惯排斥的基本能力,因此,做父母的应有更大的耐心。

对已有些不良习惯的孩子,既不能放弃信心,任由其坏下去,却也不宜操之过急。也许,一个坏习惯形成用了多少时间,改掉这个坏习惯就需要用多少时间。如果指望在一夜之间就把孩子多年以来的坏毛病改掉,就像一个从小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的孩子,这样的生活习惯十几年如一日,忽然有一天严格要求他自己穿衣、自己吃饭,他就会产生严重不适应,甚至可能由此导致严重后果。

2007年春晚“黑色三分钟”的幕后

11

名人传记



朱军 著
江苏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朱军首次披露自己数年来主持春节联欢晚会的台前幕后,讲述自己的人生感悟。朱军在书中回忆了那些属于他自己的“零点时刻”:荣光时、黯然时、欢歌时、悲泣时……每一时刻的感悟,都使他的生命愈加厚重。

在书里,朱军将告诉我们,他是怎样突出重围,战胜对手,成为央视晚会的当家主持?他和范曾、赵本山、周涛、董卿、冯巩等人的情谊,以及春晚舞台上发生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……

上期回顾

2004年春晚,在倒计时时,我出现了口误,把“猴”年说成了“羊”年,当时我的脑袋就“嗡”了一下。直到春晚结束,我都希望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。

2007年春晚结束后,我们六个主持人集体失眠。原因我不说,大家都都知道,那就是所谓“黑色三分钟”的乌龙事故。时隔数年,直到今天,“黑色三分钟”还在不断被人解读着。为了还原真相,使它不再被过度解读,在这里,我想说说自己亲历的“黑色三分钟”。

事情原委是这样的。那年春晚由于前面的语言类节目超时,导演组临时决定把一个零点之前的节目调到零点之后,这样一来,上一首歌曲结束后,距离零点报时还空出三分多钟,刨去一段一分十秒长的固定台词,还多出两分多钟的空隙。总导演金越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六人时,台上的歌曲已经进入尾声,我们每个人都绷着神经硬着头皮上台。我心里一直在打鼓,不知道事先的预案能不能撑足那两分多钟。

我们的预案是上台以后,说完固定台词,我和周涛再一人念两份贺电,随后进入倒计时,这事就算带过。只是张泽群即兴添加的对联影响了预案的实施。泽群为了救场,自己拟了一副对联,上台之前向金越请示,金越心里没底,就没同意:“你别乱加,对联又不是咱们的强项。”泽群大概对那副对联挺满意,没舍得丢,上台等刘芳菲说完一段,他接下去就说了那副对联。

因为事先没有和我们沟通,大家瞬间就蒙了,他也比较忐忑,不小心说错了,对联没对齐整,紧张的情绪顿时蔓延开来,于是,引发了“多米诺骨牌效应”。

我看看表,在边上跟周涛说:“时间来不及了,这个电报可能念不了,咱们就往下吧,进入正词。”此时李咏已经接过了泽群的话头,也是过于紧张,忘记控制时间了,不紧不慢地撑场。听着听着,周涛急了:“得

进了,不进的话,那段正词就来不及了。”简单交流后,我就把手里的电报揣进兜里,盯着表,觉得差不多了,就找了一个气口,调高音调切入,开讲那段事先准备好的台词:“亲爱的朋友们,零点的钟声就要敲响了,一个崭新的春天即将到来!”看我起了头,大家随即也进入了预设的台词轨道,每人一句走了一轮,等刘芳菲说完她自己的半句主持词,就又轮到李咏接话。可能是之前意外太多,李咏晃了一下神,台上出现了瞬间的停滞,时间很短促,但直播的时候还是比较明显的。这时周涛又主动添加了一段台词,还未说完,李咏又接着她的话往下说,话赶话,很不幸没赶上,就这样,一下子就乱了……

随后李咏试图补救,又即兴发挥了一段。这时离零点报时还有13秒,我盯着表,眼看着秒针一格一格地跳过去,感觉浑身血液都涌上了脑袋。金越当时站在观众席边上的二号机旁,和我面对面,他不能冲上来帮忙,只能干着急。我看了一眼金越,又扫了一眼表,示意他回头看时间,此刻离倒计时只剩下11秒。金越回过身,伸手一指我,那指令明确,我想再不切入,连10秒都没了。在这个十万火急的关口,我猛然提高了声调,打断了所有人的话:“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一个崭新的春天已经来临,在这美好的时刻让我们共同祝愿中华民族——和顺和美,国泰民安!”赶了两秒,“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”,新年的钟声终于敲响!以上就是所谓的“黑色三分钟”始末。

下来以后,所有的人都特别沮丧,那么关键的一个节点上出了这么一个纰漏,谁也不吭声,闷头坐着。当时正在直播,节目还得继续,

总导演和台领导也不好说什么。我稍微缓了一下神,站起来,冲他们五个挥挥手:“行了行了,整理一下情绪,下面还有四十多分钟呢。有什么事等直播结束后再说,先把后半截干完了。”等把最后45分钟节目主持完,大家再也无心闲聊,一言不发各自回家。结果第二天起床,就看到满社会对“黑色三分钟”的议论,满眼看到的新闻都变成了我和李咏打架,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我们俩在后台大打出手的全过程。

正月十三彩排元宵晚会,制造“黑色三分钟”的主持人们又碰面了。我去先跟李咏握手,一握手我们两个就乐了。李咏说:“咱们俩得拥抱一下。”我问:“怎么了?”他一脸苦笑:“要不然说咱们打起来了。”我一想也是,就朝他张开手臂:“来,拥抱一下。”拥抱完我又忍不住笑了,“这样人家更得说咱们俩打起来了,这两人怎么过完年回来还拥抱?显然又和解了。”那个事故在当时可算是扎在每个人心里的一根刺。时间过去那么久,现在我们都能够坦然面对了。我之所以重述这段所谓的“黑色三分钟”,是想澄清一些事实,它并非如外界所言,是我们主持人之间互相拆台、人为抢词造成的。当时大家都在想办法补台,但由于应对危机的经验不足,相互没有配合好,再加上在那个关口上过度紧张,所以接连造成了口误,导致了所谓的“黑色三分钟”。

也是从那一年以后,导演下了明确指令:“上去无论发生任何情况,一切交给朱军一个人。”从那时开始,我真正体悟到何谓“老同志”,真正明白了作为春晚“资深主持”所必须的担当。舞台越大,荣耀越大,你所担负的责任也越大。

说实话,对主持人来说,春晚赋

予的责任重大,但空间不大。站在台上,我们没有那么多自由发挥的余地,春晚主持人更像一支黏合剂,努力黏合节目之间的缝隙,这是一个精细活儿,要做到精确而不着痕迹。如果真的要在这个舞台上寻找一个发挥的空间,也就是救场的那一刻。那是一块试金石,多少年的积累,你有多深,你有多厚,你有多少定力,在那一瞬间肯定要爆发出来。

2011年春晚,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。当我和我的五位同事周涛、李咏、董卿、张泽群、朱迅把既定主持词说完后,离零点倒计时还有整整1分20秒,耳麦中响起了总导演的补台命令,就像是赛场上的发令枪,我来不及思考,更不容迟疑,迅速调整,进入战斗,在开口说话的同时,我甚至还看了一下坐在观众席最后一排的焦利台长,从他坐姿的变换中我感到了洋溢全场的紧张。似乎仰仗一种职业本能,现场的一切瞬间转换为奇妙的力量,打开了我的思路。1分20秒之后,新年钟声零误差敲响。到了后台,我得到了导演和同事“太棒了”的称许,自己当时也有劫后余生的喜悦。

但到了第二天起床看重播的时候,一丝丝然在我心底慢慢蔓延开来。虽然貌似圆满完成了任务,但回过头来再看的时候,不免有些赧然,那段自行添加的台词整体比较空洞,除了一句“凝望着母亲的白发,抚摸着孩子的笑脸”实实在在地传递出了人生的某种况味——这是徐小帆生前,我们俩经常在一起发出的感叹。但故人已去,当年的祝愿竟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。虽然这个梦想之于小帆已彻底破灭,我也有一半无法实现,借着春晚传达给他人也无可,可我还是觉得唐突了故人。